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香港金紫荊廣場：身分認同爭議

Contesting Identities: Golden Bauhinia Square in Hong Kong

doi:10.6752/JCS.201609_(23).0009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陳蕙(Selina Ching Chan)

頁數/Page：165-18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9](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Contesting Identities:
Golden Bauhinia Square in Hong Kong

Selina Ching Chan

香港金紫荊廣場：身分認同爭議

陳蒨

鳴謝匿名評審的建議和評語，也感謝李承昱協助翻譯有關部分的初稿及鄧皓荃校對稿件。

陳蒨，香港樹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電子信箱：：scchan@hksyu.edu

摘要

本文以香港金紫荊廣場作為案例，分析空間物質性的經濟與政治，和人們對物質性空間的象徵意義的再創造、運用與消費；研究國家與民眾在廣場上的互動，探討地方的意義與身分認同的關係。本研究尤其關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政府如何通過地方建構來表述國家主義，替香港人凝造一種國家感和中國人身分認同；並且分析香港人如何挪用廣場，表述其複雜而矛盾的情緒和後殖民的身分認同的內容。

關鍵詞：身分認同、廣場、國家主義、香港、空間、地方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physical construction of space, as well as how people appropriate, consume, and recreate the meanings of material space. It investigates the power dynamics between people and government in the square. It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pla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identities. This research also investigates how the government conveys nationalism through the place-making process, and constructs a sense of nationhood within China as a whole, hence promo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for Hong Kong people. It delineates the complex yet contradictory sentiment of the postcolonial identit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how Hong Kong people appropriate the square.

Keywords: Identities, Square, Nationalism, Hong Kong, Space, Place

一、緒論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率先論述有關政府的(governmental)和規訓的(disciplinary)政權如何建構空間和地方，並且創造出不同的敘述(narration)和挪用(appropriate)地方(1995)。近年，空間的權力成為學者研究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和建構地方(place-making)的一個重點關注對象。一方面，現代的民族國家往往藉著構建地方來凝聚國家的身分認同(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13; Kong and Yeoh 2003; Meethan 2001: 16; Leong 1989)。另一方面，地方建構的過程直接展現了在多種多樣的政權之下，國族主義的命題和身分認同的話語(identity discourse)（如Johnson 1994; Allen 2007）。

對於空間的研究，一方面要分析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即經濟或物質基礎，包括各種各樣功能性的建築和設施；也要理解空間的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所涉及國家概念化和規訓統治的策略，包括物質結構，如公路、機場和資訊的網路等如何反映了商業世界、貨幣權力和國家政治，表現了現代資本主義及國家機器的力量，形成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 Lefebvre 1991)。另一方面，要注意表象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即是指使用者如何通過共同志趣，運用物質性的象徵符號，拒絕現代國家霸權和資本主義把空間的「日常生活」「異化」，反對抽象空間的同質性(Lefebvre 1991)。

事實上，人們如何挪用及消費空間，表達了不同權力之間的矛盾。故此，地方建構與意義，「不能被簡化成一個單一維度，而應該是在不同力量關係之間所構成的多樣性的集合或權力機器」；地方應該被視為一個「形成中的環境」和一個「形成中的地理」(Grossberg 1996: 180)。空間的產生和消費是由不同群體互動產生的一個持續的和動態的過程(Lefebvre 1991; Appadurai 1996)。地方的建構一方面表現了國家如何展現霸權力量製造地方、詮釋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地方呈現了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知識和情感的流動，因此空間的意義常常出現爭議(Lefebvre 1991)。事實上，地方的意義既包括物質與實質結構的分析，也涵蓋了人們在空間的流動和互動，以及社會對這空間詮釋的知識、歷史和符號的意義。

本文承接上述對空間物質性的經濟與政治，和人們對物質性空間的象徵意義的再創造、運用與消費的分析，以香港金紫荊廣場作為案例，研究國家與民衆在廣場上的互動，探討地方的意義與身分認同的關係，尤其關注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政府如何通過地方建構來表述國家主義，替香港人凝造一種國家感(a sense of nationhood)和中國人身分認同；也分析港人如何挪用廣場，表述香港人複雜而矛盾的情緒和後殖民的身分認同的內容。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論述香港在回歸中國的情境之下，「規訓的」和「政府的」政權如何創造和經營金紫荊廣場。廣場是給公眾在重要場合聚集的地方，是政治場域——「節日的遊行盛會，黨的指示的宣布，甚至是對抗人民的敵人的鬥爭集會」(Hung 1991: 90)。本文指出金紫荊廣場是回歸後第一個及目前唯一一個官方詮釋歷史記憶的公共空間，檢視香港政府如何透過利用物質的和話語的策略，構建金紫荊廣場，以及宣揚國家概念。文章分析香港政府用了什麼內在的空間策略來讓香港人融入「國族」(nation)之中，關注一系列的空間行為工程如何建構港人對國族主義的認同，亦把金紫荊廣場的構建視為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的目標，探討政府如何通過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公眾儀式，進行教化和傳達國家價值的主權。

文章的第二部分檢視個體行為者(individual actors)如何把國族構建(nation-building)的宏大過程解讀為日常行為的方式，探討個人如何根據政府規劃及指引在金紫荊廣場進行特定的活動，如參加升旗儀式和紀念這個地方的歷史等活動，分析廣場上儀式化的行為(ritualized practice)如何強化國族主義(nationalism)。本文的第三部分分析個人及群體如何在這個空間施展自由意志和控制，迴避官方的國族意識形態規訓，以及怎樣賦予這個空間新的意義。筆者也討論廣場是如何被轉變成為一個觀光凝視(tourist gaze)的地點，和一部分香港本地人是如何把「國族主義的」地方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地方。同時通過再創造地方意義的過程，部分本地人擁護了自殖民時期起的主導意識形態，即是資本主義的敘述和自由民主的精神，彰顯其身分認同。此外，本文也分析個人及部分群體如何在抗衡與政府所施加在金紫荊廣場上的權威性意義的過程中組織，新的本土敘述(narratives)，從而強調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及其特質，淡化政府所施加在金紫荊廣場的主導意識形態，並且反思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展現公民文化意識中的自反性(reflexivity)。

二、方法論

本文沿用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法，在2010年至2012年間在金紫荊廣場進

行觀察和訪談，共進行30次考察，分別在平日和週末的早、中、晚不同的時段，在金紫荊廣場進行三至五小時的觀察和訪談。期間與不同的人，包括各類遊客、商販、本地人等進行訪談。同時亦隨機在金紫荊廣場以外的地方與50位香港人進行訪談，探討他們對金紫荊廣場的理解和觀感。此外，本文也依賴媒體對金紫荊廣場的歷史報導來分析它的意義。

三、官方敘述：通過紀念碑和雕塑回憶過去、展望未來

金紫荊廣場為處灣仔香港會展中心外，面對維多利亞港，於1997年落成，是香港政府為紀念香港回歸中國而建的。廣場的命名來源於其主體建築，一座金色紫荊花的雕塑。事實上，自1965年以來，港英政府就已經將洋紫荊花選為香港的象徵。洋紫荊(*Bauhinia Blakeana*)這個品種的花，最初是被法國的傳教士於1880年發現，並以港督卜亨利(Sir Henry Blake)和他的妻子來命名的。¹

為慶祝香港回歸，中國政府把一個6公尺高的金紫荊雕塑送給香港作為禮物。「金」紫荊乃寓意香港的長久繁榮，就像一朵長期盛開的紫荊花。香港的長盛不衰是香港民衆和中國大陸民衆的共同祈望。更重要的是，香港長盛的未來卻一定離不開中國的支持。這種港中之間依賴的關係可以在具象徵意義的雕塑設計之中發現。雕塑包含兩個部分：紫荊花和一個象徵著中國長城的城牆底座。整個雕塑象徵香港之所以能夠繁榮一定是基於中國強力的支持。在1997年7月1日，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日子，官方熱烈地慶祝香港回歸，此雕塑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錢其琛先生和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揭幕。在雕塑的旁邊可以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的兩個旗桿。高一點的旗桿是國旗的，而低一些的旗桿是區旗的。的確，在雕塑的結構和兩支旗桿的高度之中，不難發現香港與中國之間的等級關係。

中國政府贈送的金紫荊雕塑，和香港政府建構的廣場都是國家的領土策略。有關領土的策略，包括土地測量、國家界線的釐定、制定地圖、交通、集體基建、及制定地域性的團結和整合的工程(Brenner and Elden 2009: 369)。作為領土的策略，金紫荊廣場一方面象徵著銘記香港領土回歸的意義；另一

1 它的中文名是洋紫荊，但現在也普遍被稱作紫荊，去掉了「洋」字。然而，紫荊與洋紫荊並非同一類花（李嘉言 2008）。

方面，它是本港唯一可以用作舉行與國家有關儀式的公共空間，藉此培養香港人在回歸後的國族情結及發揮凝聚力。同時，官方也利用媒體推廣金紫荊廣場的國族意義，香港主要的免費電視台每天晚上新聞報導之前都有一段播放國歌的短片，短片其中一幕就是金紫荊廣場上飄揚的國旗。所以基本上每個香港市民腦海中都能夠輕而易舉地浮出金紫荊花的視覺圖像，這固然是官方利用媒體建構地方意義的方法。

金紫荊廣場的兩個物質性的結構展示了國家領土的策略，凝聚神聖化的歷史記憶和展望美好未來的地方。物質性的主體部分金紫荊花雕塑，象徵著光明的未來；物質性的另一部分，回歸紀念碑，則敘述官方的香港歷史。這個紀念碑坐落於會展中心西北方的開放區域中。紀念碑的高度達20公尺，寬達1.6公尺。在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上，紀念碑由胡錦濤副主席主持揭幕。紀念碑的中文全名「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是由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的並銘刻在碑柱上。這是官方在回歸後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在公共空間詮釋的歷史記憶。這對於前殖民地的香港來說是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尤其是因為殖民時代官方從來沒有在公共空間敘述香港歷史的，² 殖民時代公共空間承載的記憶都是有關殖民統治者的，例如公園或道路均以殖民官員或英皇帝國領袖為名。然而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上有的的是國家詮釋的香港歷史。它從幾個方面緬懷了香港歷史。首先，它紀念了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和一個特別行政區。位於碑柱底座的206塊石板代表從1842年殖民地設立直到香港回歸中國後的50年，即是至2047年這段歲月的總年數。其次，一些重要的年分被挑選出來紀念殖民歷史和香港特區的成立。除了以一個火環的標記紀念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以淺色的花崗岩做的六個環形石板用來紀念1842、1860、1898、1982、1984和1990這幾個殖民時期的年分(In Commemoration of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1999)。1842、1860和1898這三個年分是為銘記殖民歷史的開端：1842年，香港島在〈南京條約〉中被割讓給英國作為殖民地；1860年，九龍半島和昂船洲在〈北京條約〉之下割讓給了英國。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的二百多個離島通過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給英國99年。正是因為這個租借條約，香港才不得不在1997年回歸中國。1982、1984和1990這三個年分是為紀念中國政府是如何準備香港回歸中國的。在1982年，中國政府開始與英國政府談判香

2 博物館的香港歷史也不過是80年代以後才添加的，詳見下文。

港回歸事宜。1984年和1990年的標記是因為兩個指引未來香港政策的重要文件的簽訂。在1984年，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落實香港1997年之後的基本政策實施方案。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設想和香港原有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被保證將在回歸後維持50年不變。在1990年，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基本法〉，確保「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

總的來說，紀念碑第一部分敘述的是香港歷史。「香港地處中國南疆，水清港深，居民聚族蕃衍，航通遠洋。1840年鴉片戰爭後，英國割占香港、九龍，又挾勢租借『新界』。香港倚東西交匯之利，以自由港促進國際貿易，勵行法治，民既勤奮，經營有成，且得祖國多方支持，蔚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以上的描述包含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簡要歷史概述。它提到香港早前發展成為了一個自由貿易中心到之後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這兩個有趣的重點是值得留意的。第一，進步和經濟發展被著墨成一個重要的香港故事，並且蘊含著一個典型的、公式化的過往記憶。的確，媒體普遍把香港的經濟奇蹟描述為一個主流的歷史敘述(Ma 1999: 77)。第二，在這個進步發展的故事之中，英國管制的功績被輕輕帶過。香港的經濟發展被解讀為是中國政府支持的結果而不是認可英國的管制。這與自殖民時代遺留下的官方所論述，即經濟成功發展主要有賴於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有所不同。這個碑銘敘述並聲稱國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來管理和維繫經濟發展。

在第二部分紀念碑的敘述中，關注的是1997年主權交接，詳細描述有關回歸典禮並且認定香港回歸是領土問題，「百年神州，憂患無已，有志之士，無時不圖收復國土。改革開放以來，國勢日強，我國宣布於1997年收回香港。」亦指出中國政府對香港這個世界性都市(cosmopolitan city)的民主和繁榮的支持，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是作為鄧小平「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理念的結果。

顯然可見，官方透過金紫荊廣場的紀念碑塑造了一個特殊框架的集體記憶，同時帶來記憶和遺忘。事實上，把國家榮耀記憶銘刻在地標性的紀念碑是現代國家常見的現象(Young 1999: 6-13)。雖然金紫荊廣場的紀念碑強調以回歸過程的獨特視角來敘述香港歷史，然而公眾對於這個紀念碑和其內容卻視若罔聞，儘管所有的香港人都在媒體中知道金紫荊廣場的形象，絕大部分受訪的香港人甚至沒有覺察到紀念碑的存在，也不覺得不知道它存在有所遺憾。即使曾經去過廣場的被訪者也大多不知道紀念碑的存在，紀念碑根本引

不起受訪者的興趣，並且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幾乎是毫無個性的，這恰恰表示了香港人對回歸的矛盾和無可奈何的感情。

四、國民教育的場所

金紫荊廣場作為一個國家領土的策略工具，也是經營國族主義有關儀式舉行的地點。事實上，香港在殖民時期並沒有在任何公共空間舉行固定的升旗儀式。今天，金紫荊廣場在教育局和政府的指派下，成為舉行升旗儀式的公共場所和國民教育的重要地點。用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的話來講，升旗儀式的確是政府帶有影響和調控的目的來主導民衆參與的「程式化活動」(programmatic activities, 1984)。下文分析在學校、青年團體和各種政府部門的參與之下，國民教育是如何通過在廣場以表演性(performative)的升旗儀式進行的。

只要分析學校的課程和部分課外活動，不難發現所有的香港小學生都要學習金紫荊廣場的歷史意義和國旗、區旗、國徽的意義，也知道國旗和香港特區旗都在金紫荊廣場升起，前者升在較高的位置而後者處於較矮的位置。這與殖民時代「去政治化和去情境化」(depoliticized and decontextualized)、避免侵犯當代中國和其他敏感話題及有意識默許國民教育的缺失十分不同(Morris and Chan 1997: 249; Kuah-Pearce and Fong 2010: 434)。在殖民歲月，國族象徵和國旗都不是普通香港人的常識。與之相反，自從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就開始實行國民教育，而且特別關注於國旗升旗儀式和成立護旗隊(Kuah-Pearce and Fong 2010: 440)。事實上，金紫荊廣場是香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每天舉行升旗禮儀的公共空間。同時，政府規定官立學校在國慶日和一些重要場合掛國旗，並鼓勵非官立學校也這樣做(Kuah-Pearce and Fong 2010: 440)。在香港升旗隊總會的協助下，升旗儀式在學校廣泛地舉行。學生會學習正確升旗的姿勢、儀式的過程、折疊國旗的步驟、旗桿的定立和其他設備的處理。儘管一些學校沒有空間懸掛國旗和進行升旗儀式，學校會組織課外活動，讓學生去金紫荊廣場參加升旗儀式。因此，金紫荊廣場成為了一個國民教育的場所。

升旗儀式是正式和表演性的紀念性典禮，因此如Paul Connerton(1989: 51-67)所指出，它是有效的助記工具(mnemonic device)。這些紀念性的典禮儀式具體化了對於過往的再現(representation)——香港回歸中國和今天香港屬於

中國的一部分。舉行種類多樣的升旗儀式是爲了增強國民身分認同，和在各種場合加固香港人對於回歸的記憶。在金紫荊廣場，每天都會有基本升旗儀式，加強版的升旗禮也會在每月的第一天舉行，還有特殊升旗典禮會在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紀念日）和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舉行。在普通日子的每天早上7：50至8：03舉行，5位身穿著禮服的香港警員組成一隊，負責主持升旗儀式(Hong Kong Tourism Board 2014)。加強版的升旗禮在每月第一天舉行。15位警員和10位配備長槍的護衛隊負責升旗禮。在慣常的國歌之後，會由警察風笛隊表演歷時10分鐘的音樂演奏。

在國慶日，除了升旗典禮，在維多利亞港會有兩艘消防船噴水進行表演，並且還會有掛著香港區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兩架直升機從廣場西邊飛往東邊。來自警察風笛隊的表演者不單演奏風笛還會進行步操。許多其他政府部門也會參加升旗儀式的表演，如消防處、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和香港懲教署的代表等。行政長官、立法會會員等政府官員也會參加升旗典禮。公務員通過參加升旗典禮來參與、接受國民教育(nationalistic education)。在金紫荊廣場舉行的升旗儀式，很明顯是一個由政府驅動的國民教育程式化的活動，藉此建構中國人的身分認同。

金紫荊廣場的升旗儀式也是一個牽涉公眾參與和傳達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景觀(spectacle)。據觀察，不少學校安排學生去觀摩典禮。小學的孩子們看上去是最享受這個遠足的。不少小學生表達當看到升旗儀式的時候他們感到作爲中國人的驕傲。有一個小學生說，「我非常開心有這樣的旅行。我印象非常深刻。」另一個小學生說，「當我在看升旗儀式和聽國歌的時候，我很感動，以一名中國人而感到驕傲。」還有一個孩子說，「當我看見升旗儀式和聽到國歌的時候，我感到驕傲。它讓我想起了回歸典禮。」隨著時間的推移，不難發現國歌已經逐漸變成「學生自己的頌歌」(Mathews, Ma and Lui 2008: 89)。這與Eric Hobsbawm(1983: 12)的公民不得不與符號、儀式和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如旗幟、圖像、典禮和音樂相聯繫的觀點相呼應。這些學生參與的升旗儀式，幫助強化了社會與他們的連結(Connerton 1989)，至少是在短暫的儀式化場合期間。正如Mathews、Ma、Lui(2008: 89)精確地指出，在國族身分認同被教授了超過10年之後，學生已經漸漸學會去尊重國旗且至現在已與國旗產生了認同。雖然如此，據筆者的觀察，也有一些學生並未對國旗和國歌產生強烈的情感，他們在升旗儀式之中也並不專注。據訪談，他們指出是老師要他們來的，並沒有選擇，他們對升旗儀式知

識認知上的理解，覺得是例行公事，沒有特別的情感和興奮，來金紫荊廣場觀禮不過是課外活動而已。

除了小學生之外，在金紫荊廣場的升旗儀式也充當著給那些通過積極參與升旗的青年人一個重要的國民教育機會。自從2008年7月13日起，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經過培訓的11位被選中的青年會操作升旗禮。這些青年是來自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童軍總會、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民衆安全服務隊、香港海事青年團、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基督女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紅十字會、香港航空青年團和香港交通安全會。每個團體每年負責升旗禮四次。有時候一些中學的合唱團也會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國慶日參與活動獻唱國歌。顯然，這些都是青年人在學校或其他團體參與的課外活動。

香港政府在金紫荊廣場上傳達國族主義、進行國民教育。顯然，不同機構的學生、青年和公務員僅僅是跟從政府指派的行程，透過見證和參與這些儀式來執行、表演程式化的活動。這並沒有給個人創造力提供多大的空間，而且可預見的是這些活動增強他們對國族符號的認知，有時亦會讓他們在儀式過程中產生了短暫的國族情感。

五、紀念榮耀、悼念悲痛：勾勒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本節進一步探討政府如何於特別的時刻在金紫荊廣場進行儀式，紀念榮耀和哀悼集體悲痛，藉此創造和增強想像共同體的團結感。筆者將檢視在金紫荊廣場舉行的升旗和下半旗的程式化活動(programmatic activities)如何映射Anderson(1983)所敘述的想像共同體的愉悅與悲傷時刻。

Ernest Gellner (1925-1995)指出國族主義的起源與現代性息息相關(1983)。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初，當時中國處於帝國主義和國家存亡的迫切壓力之下，中國的國族主義在國家救亡意識的影響之下，出現爭取現代化的「自強運動」、在十九世紀末出現的義和團運動、1911年中華民國誕生和1919年五四運動(Zhao 2004: 18-19)。在這些運動之中，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學生通過與帝國主義鬥爭彰顯愛國精神，特別是抗議德國按〈凡爾賽條約〉把山東的主權移交給日本。同時五四運動亦是一個試圖推翻舊社會且促進科學、民主和現代思想的國民運動。

去殖民化之後，香港才開始在公共空間舉行對五四運動的紀念活動。從2006年開始，香港政府每年5月4日都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具有特色的升國旗禮，重拾和頌揚五四運動的精神和遺思，鼓勵香港的青年跟隨1919年那些青年的腳步，熱愛他們的國家和為他們國家的進步與現代化做貢獻。2006年5月4日，金紫荊廣場的升旗禮是由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青年共同參加的（大公報編 2006）；2007年，有超過三千名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小學生和中學生參加升旗禮（歐陽杏櫻 2007）。在2007年5月4日五四運動紀念日上，升旗禮特別安排了著名的中國鋼琴家李雲迪和香港中華民族管弦樂團共同負責演奏國歌。4名來自香港的青年負責升旗。這時來自56個中國內地少數民族的代表團也專程來港與香港的中、小學生一起參加升旗禮（歐陽杏櫻 2007）。儘管他們的民族身分不同，他們還是住在同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內(imagined community)。通過背誦〈五四宣言〉這樣儀式化的行爲，銘記宣言的內容，期盼中國人團結共同創造繁榮的未來，體驗國家和政府凝造的國族主義。

升旗儀式不僅導人銘記過往，而且也鼓勵人們牢記輝煌的當下——中國在奧運會獲得多面獎牌。2004年9月7日，來自中國的奧運金牌得主於金紫荊廣場與普通香港市民一齊參加升旗禮。奧運金牌得主和民衆都在金紫荊花雕塑前拍照留念。同樣地，於2008年8月30日，奧運會的中國冠軍選手也來到此地，與超過500名香港市民一同參與升旗禮（商業電台 2008）。隨後樂隊還演奏了「歌唱祖國」（呂諾 2008）。除此之外，2008年的奧運火炬傳遞儀式和北京奧運會的歡迎活動，也選擇在金紫荊廣場舉行。誠然，運動、特別是奧運會都是中國提升其國際地位和宣告國族主義的重要機制（如Xu 2008；Brownell 1995），在金紫荊廣場慶祝2008年北京主辦奧運會的成就，也就把這個地點轉變成爲「神聖的」地方，由政府向香港人展現中國的成就。的確，伴隨升旗儀式，運動員、奧運金牌得主和香港人共同慶祝國家當下勝利、光榮及進步的時刻，衍生喜悅的情懷。

除了是國家成就的展示舞臺之外，金紫荊廣場也是一個悼念國家傷痛的地方。在2008年的5月19日，爲了哀悼四川地震中的受害者，廣場下半旗致哀。在那一天，同一個時間中國很多地方也紛紛進行了悼念活動。這種儀式化的哀悼活動也代表著香港人和中國內地人之間的連結。的確，紀念和悼念活動促進了一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所說的同時感(a sense of simultaneity)，且培養了國族主義(nationalism, 1983)。

六、觀光凝視和資本主義

地方建構的過程不但與政府實施的儀式化活動有關，而且和人們如何追溯他們日常生活的軌跡有關(Feuchtwang 2004: 10)。因此，本節研究人們在日常實踐中如何運用金紫荊廣場，並分析他們運用什麼樣的策略(tactics)。關於策略，Certeau(1984: 36)指出它有異於盲目跟隨政府指示的程式化活動，而是一種反映個人自由和掌控環境、個人自身命運的行為，是對環境做出的反應，是一種不可預知的行為，並且有時候會間接影響政府施政(Certeau 1984: 30)。在下面兩節，筆者會分析在挪用(appropriate)金紫荊廣場這個地方的過程中，多種多樣的日常策略是如何反映個人的自由和自反性(reflexivity)。透過展示不同群體如何挪用金紫荊廣場轉化官方對廣場政治化意義的論述，分析廣場的意義是如何從Henri Lefebvre (1901-1991)的被動「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變成爲意識形態的動態點(dynamic site of ideology, 1991: 39)，論述金紫荊廣場如何成爲了內地人觀光凝視的地點和本地人商業的場所。

在金紫荊廣場，人們會看到爲數不少的中國內地遊客。據調查，幾乎任何時間都會看到十輛以上的觀光旅遊巴士停泊在金紫荊廣場附近。大部分的觀光客都是從中國內地來的遊客，很少見到本地人和外國人。事實上，金紫荊廣場是香港旅遊發展局在官方中文網頁上向能閱讀中文的遊客推薦的十大景點，連同金紫荊廣場一起被官方推薦的是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相關介紹有三大主題：第一是有關回歸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廣場舉行的歷史事實介紹；第二是解釋金紫荊花是回歸時中央人民政府送給香港政府的賀禮；第三是介紹升旗儀式和有關時間。明顯地，官方對內地遊客介紹廣場的內容強調了國族主義及領土的主權，這固然已經超越Lefebvre說的空間策略，而是Brenner and Eden(2009: 365)說的領土策略。然而英文版的介紹卻稍有不同，相對來說只是簡略地提了回歸，較多篇幅是描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是一座現代化的建築物，也是國際知名香港藝人在電影中的布景，強調的除了回歸以外還有的是香港作爲現代國際都市的地位。縱使官方對英語國家的觀光客和內地或其他華人遊客用了稍稍不同的方法介紹廣場，金紫荊花和廣場仍然是官方著力塑造的一個凝視地點。

國內的遊客在遊覽金紫荊廣場的時候，大致認同官方的詮釋，大部分來自中國的遊客覺得金紫荊廣場意義重大。很多內地遊客說他們是通過電視媒

體知道這個地方的，並且認為金紫荊廣場紀念了香港回到祖國，因此非常特別。其中一位遊客說，「我們是通過電視和廣告知道這個地方的。1997年7月1日的主權交接儀式的現場直播在國家電視台播出，很多內地人見證了交接的時刻。」另外一個遊客說，「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當然知道在香港有一個金紫荊廣場，因此我們一定要來拍照留念。廣場具有極大的價值因為它標記了香港回歸中國。」有一位觀光客說，「在金紫荊廣場拍照讓我們想起了香港回歸中國。」總而言之，對內地人來說金紫荊廣場毫無疑問是一個值得觀光凝視的地方，它加強了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聯繫，紀念了香港回歸祖國的喜悅。有趣的是，也有些大陸遊客表示這個廣場太小，比不上內地城市的廣場。一方面，國內遊客說的固然是事實；另一方面，這個隱喻也表達了中國大陸與香港的主次之別。

金紫荊廣場為數不多的本地人就是替顧客們拍照的商販，在假日會有超過二十多個照相攤位，他們早上大約7時開始為來自中國內地的遊客服務。這些小商販基本上拍的是兩個景點。第一個是以金紫荊花雕塑和國旗為背景替遊客拍攝，現場並有照片的樣板放著吸引遊客。這也展示了觀光發展的拍照商販，如何支撐觀光凝視有關國族主義的生產。第二個就是替遊客拍攝以維多利亞港為背景的相片，現場同樣也有漂亮的樣板照片，那些高樓大廈正好回應了香港歷史有關資本主義的論述。這些為數不多的為人拍照的商販和賣冰淇淋、小食等小販的行為表示了香港人如何靈活地採取新策略，不把金紫荊廣場當作一個銘記國族主義的地方，而是利用大陸人的國族主義情結，在金紫荊廣場創造小本攝影生意的契機，從而謀生獲取經濟利潤，同時又展示了資本主義與觀光產業建構地方意象的過程。

幾乎無一例外的是，每個從大陸來的旅客都會在金紫荊廣場前給自己拍照留念，當然有不少也會光顧專業攝影師讓他們協助拍照。現場所見，遊客都會圍攏在金紫荊廣場拍照，其後大部分的人會在廣場邊上拍攝維多利亞港。有意思的是維多利亞港的風景主題是摩天大樓，讓人銘記的是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繁華與發展。維港的高樓大廈景色，回應了現存官方主流的香港記憶所偏重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及經濟奇蹟的論述（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 2009：4）。這個主流論述「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³的內容是：

3 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 提出「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 和「小敘事」(petit recits) 的觀念。他指出在後現代的社會，地方式的敘述應該取代「大敘事」(李

「從1842年之前香港還是一個小漁港說起，然後經過1842年鴉片戰爭開埠之後，香港就成爲了一個自由貿易港。50、60年代，香港就是個製造中心。到了現在，香港就成了一個國際大都會。」（郭恩慈 2009：11-12）‘維港兩岸的景色就恰好說明了國際大都會的景觀，金紫荊廣場前維港的景色的意義也是國家領土策略的一部分，是一個象徵符號，承載和傳承著香港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上，金紫荊和維多利亞港這兩個觀光地景都顯示了國家的領土策略與資本市場下的觀光業界，如何共同塑造地方的意義和凝視的地標。有意思的是，內地遊客在拍照的同時也就收集及再生產了有關官方和資本市場建構的刻板印象。

相反地，大部分香港人對於金紫荊廣場的態度是熟悉及冷漠的。熟悉的原因是前面所說，在電視台每天晚上播放國歌的短片、內有金紫荊廣場的影像。所以基本上每個香港市民都能夠輕而易舉地在腦海中浮現出金紫荊廣場的視覺圖像，這固然也是官方利用媒體建構地方意義的方法。雖然港人都熟悉廣場，然而，引人深思的是大部分香港人選擇忽視這個廣場，除了參與國民教育的學生以外，平時根本沒有普通香港人在閒逛。根據觀察，廣場只有在清晨時分會有些老人在海邊做運動，通過在海邊做晨練的行爲，這個廣場變成了一個追溯這些老年人日常生活實踐的窗戶，這個零星的個人行爲與官方宣揚的意識形態完全沒有任何聯繫。

根據訪談，大多數受訪的各年齡的香港人都說這個廣場是一個政府舉行慶典的地方，只有進行國民教育的學生才會去的，故此廣場亦不是代表香港的地方。換句話說，這個地方並不能追溯他們日常生活的足跡，因此這個地方不是「他們的地方」，這就象徵了民衆如何迴避官方宣揚意識形態權力的一種想法。更重要的是，部分香港人把金紫荊廣場聯想爲內地人的地方。受訪的港人經常指出，這個地方被內地人占滿以至於驅使他們離開的事實。的確，當看到很多內地人的時候，香港本地人有一種錯置感(displacement)。他

歐塔 2012[1979])。

- 4 香港歷史博物館自80年代中期以後，有關香港事跡的展覽，和始於1991年的「香港故事」展覽，這個去政治化的敘述難免簡化了以及美化了過去，過分集中描繪成功的一面，至於失敗、困難或當中付出的血淚卻被刻意遺忘，故此並未能全面涵蓋不同層面的、多元的香港歷史。有見於此，近年不少學者開始敘述另類的香港故事，開始側重本土文化認同的香港記憶，來論述多元的香港本土故事(Sinn 1995；吳俊雄、張志偉 2001，陳禧 2015等)。

airiti

們對金紫荊廣場的感受隱喻著一種對中國不一樣的歸屬感，和對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矛盾模糊的態度。正如一個本地人所說，「我看見很多在廣場跟雕塑拍照的內地遊客。我就很奇怪那有甚麼好拍。我不理解。那裡根本沒有東西可看。」通過將自己從廣場脫離出來和認定廣場是一個給內地人而不是本地人的地方，香港人和內地人之間的界限就已經被劃分出來。事實上，很多香港人認為內地人是「不文明的」(Mathews, Ma and Lui 2008: 76, 113)。這種界限劃分的行為，也展示了香港人作為前殖民地主體(colonial subjects)在廣場上的錯置感(a sense of dislocation)，和他們對大陸的中國人矛盾的態度，暗示了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的一種抗拒，表達了民衆對官方宣揚的國民身分認同的一些不同想法。

部分被訪的香港人解釋不去金紫荊廣場這個地方的有趣原因，是周圍缺少購物區域，這與香港殖民時期遺留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普遍廣泛性相符合，也解釋了為何廣場上零星的本地人是經營照相攤位的小商販，如同Mathews、Ma and Lui (2008: 151)所講的，香港人是被市場主導而不是被國家形塑的。

七、金紫荊廣場轉變成一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地方：頌揚本土身分認同

近年，金紫荊廣場偶爾也變成了一個本土勢力發聲及與政府抗爭的地方。本節分析金紫荊廣場如何成爲一個本土身分認同表達的地點，論述它怎樣成爲一個不同的團體或個人參與志願活動的地方，從而表達公民性與港人身分認同。在2010年8月24至26日，爲了悼念在菲律賓黎刹公園巴士劫持事件中遇難的八名人質，金紫荊廣場下半旗致哀三天，其時廣場充當著一個頌揚本土香港身分認同的地點。這個悲劇的發生是由於一名馬尼拉警務區前檢察官，劫持了一輛載有20名香港遊客的旅遊車，他和菲律賓政府談判破裂，最終殺害人質(明報編 2010)。金紫荊廣場下半旗致哀並舉行了一個默哀三分鐘的公眾悼念議式，幾百名香港人自發地加入了在金紫荊廣場的悼念。這與政府、學校和紀律部隊所組織的成百上千人參加的升旗禮很不同。這種由香港人自發參與的下半旗默哀儀式展示了公民憐憫性，見證了一種香港人之間想像的親密感(a sense of imagined closeness)和凝聚感(a sense of togetherness)，也展現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香港市民和非政府組織在金紫荊廣場舉行了慈善活動和不少與本土議題有關的示威遊行，廣場也因此暫時變成了一個特殊的公共空間；活動舉行期間展示了香港人的公民性，彰顯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由香港最大銀行之一的香港渣打銀行組織的一年一度的慈善活動，自2001年起也常以金紫荊廣場作為其活動的起點和終點（渣打香港馬拉松 2001）。這項慈善活動是用來支持許多本地的慈善機構，如香港防癌會、負責中國內地護眼項目的香港奧比斯、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通過吸引香港人在這個公共空間參與運動和慈善活動，一種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感覺被強化了。2008年支持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社群平等機會的非政府組織，也在金紫荊廣場舉行香港同志遊行（香港同志遊行2008）。香港同志遊行的參與者用一面巨大彩虹旗幟來包裹金紫荊雕塑的底座部分。根據他們的觀點，金紫荊花的金色象徵香港身分認同中的資本主義價值，而彩虹旗為香港添加更多顏色，象徵對於多元性的接納與尊重，開放與自由構成香港身分認同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香港同志遊行2008）。有意思的是，在金紫荊廣場展示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感也在反政府霸權抗議中表現明顯，這個過程賦予了金紫荊廣場新的本土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展示香港人如何透過扮演監察國家和政府的角色來表達公民性。2005年11月13日，非政府組織反對對香港標誌之一的維港進行填海，試圖遏止政府的維港填海工程，而在廣場進行抗議活動。保護海港協會、保護維港行動和海港之友在金紫荊廣場啟動了一個鼓勵保育維港，和呼籲停止對海港開墾和破壞的名為保護維港嘉年華週的活動（蘋果日報編 2005/11/11）。有關環保的命題上顯示的是部分港人對資本主義的反思。事實上，九七後的香港開始有不少以環境保護為題的保育活動在社區出現，這主要是由於地方社區及部分市民逐漸開始反思殖民時代沿用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Lu 2009)，環保的議題很自然地成為讓公眾發表民主聲音的合法公共領域(Lu *ibid.*: 268)。可是，這些發生在金紫荊廣場的抗議都是官方未能預料會在廣場上發生的行為，用Certeau(1984: 30)的術語來說，這些是可能往後間接影響或妨礙官方決定的「策略」。

不單如此，金紫荊廣場也成為了一個不同政治和社會團體表達他們對國家和政府不滿的地方。在2008年10月1日，超過10名四五行動成員於升旗禮期間在金紫荊廣場前進行抗議。⁵他們是對有關中國大陸毒牛奶（三聚氰胺）

事件中，國家監管食品安全不當進行抗議。2014年，香港發生政改諮詢的爭議，學民思潮、學聯和佔中三子發動反對政府推行「政改」，要求撤回有關的方案，並且在9月28日開始佔領金鐘、銅鑼灣及旺角三地的主要馬路，歷時79天。10月1日，學民思潮成員參與金紫荊廣場舉行的升旗禮，在升旗儀式進行的時候，學生代表背向國旗，舉起雙手作交叉狀（頭條日報編 2014），象徵反對政府在政改一事上漠視民意。同時也有個別議員打開黃傘支持學生。社會民主連線立法會議員及支持者則在廣場外示威，高喊「公民提名」等口號……（周偉立 2014）。凡此種種抗議也把金紫荊廣場的意義豐富起來。另一邊，「保衛香港運動」的成員也動員一些支持者來廣場參加觀看國慶升旗慶典。發言人傅振中說：「我覺得很悲哀，我們也是黑頭髮、黃皮膚，但他們連基本尊重國家的認識也沒有，我認為他們應該繼續進修。」廣場上出現的是多元的聲音，有公民抗命的行動，有「保衛香港」的聲音，有反對及支持政府、國家的聲音。在那個時候，金紫荊廣場不再是一個和諧的地方，也不再是純粹國家權力建構的地方。反之，抗議的聲音使得金紫荊廣場成爲一個企圖不僅是影響香港政府、甚且影響中國內地政府的，具有本土意義和香港聲音的公民廣場。

在金紫荊廣場自發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或運動，彰顯的是香港人的現代公民性，這些活動顯示的是港人互相扶持和尊重的公民精神，也有的是表達民主自由的公民精神，廣場的公共空間有不相同的聲音，有官方安排的國民教育活動，也有自發抗爭的社會運動，包括默哀、慈善、支持性傾向平權、保衛海港的環保運動、維護食物安全的訴求、以及政改的爭議等等。這些活動表達了不同形式的公民性，包括憐憫、慈善、民主自由的追求。事實上，香港人在廣場上彰顯了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精神，也表達了對多元文化的接納和追求。誠然，在回歸後的香港，對民主和多元聲音的自由表達漸漸成爲香港本土身分認同的重要內涵，也是港人深感自豪的價值觀，這個內容與80年代香港人以經濟優越來表達身分認同，和劃分自身與大陸人的差異截然不同。今天香港人在挪用金紫荊廣場的時候，表述的是一個具開放性、自由、民主的公民身分認同，也就塑造了香港人和中國大陸人的差異性。這個後殖民論述強調民主自由的現代公民意識，比官方論述的經濟歷史國族霸權符號豐富得多。

八、結語

本文討論了後殖民香港的國家政治霸權和本土意識權力的空間化過程如何在金紫荊廣場上展開，並且對身分認同做出爭議。回歸後的香港，中國政府透過特區政府執行領土的實踐(*practice*)，敘述領土主權的完整性。本文從三方面說明金紫荊廣場是九七後中央及香港政府實施的領土策略：一、建造工程與舉行特定的儀式；二、廣場的碑銘對香港歷史記憶的詮釋；三、對遊客推廣廣場時暗示領土的完整性。本文同時也敘述了國家如何通過金紫荊廣場的建構，指引香港人在回歸之後用一個新的身分認同去再想像(*re-imagined*)自己的身分。政府通過儀式化的表演和慣例化的紀念活動，在廣場的空間讓香港人接受成為中國「國族」(*nation*)的一部分。一方面，升旗禮這樣程式化的活動是用來讓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國民教育的地點。另一方面，紀念碑的豎立及內容表示國家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官方記憶與詮釋。正如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所設計的，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很明顯地嵌入進了金紫荊廣場。

金紫荊廣場上規範化的儀式、日常行為、零碎的經驗和有組織的不同類型的抗議活動，各自帶有異同的情感，牽涉不同身分認同的話語，提供了機會讓我們研究身分認同的爭議。雖然政府似乎仍然沿用經濟歷史國族主義來建構地方的意義，也努力通過在金紫荊廣場儀式化的表演和有組織的活動，培養國族主義和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但是個人和不同的社群會以各自的立場挪用金紫荊廣場，支持、反對或迴避官方的論述，並且提出新的敘述，使得廣場充滿爭議性的意義。

在日常行為中，香港人普遍通過不到訪廣場，和認定這是一個給中國內地遊客的地方來忽視這個廣場，展示了對於國族身分認同的矛盾和模糊態度，挑戰了官方權力對地方建構所作出的身分論述。與此同時，各種各樣的草根或抗爭運動也偶爾會出現在廣場上，紀念碑和金紫荊廣場因此漸漸被聯繫到大眾生活和香港社會。透過不同種類的公共活動參與，那些牽涉環境保護議題的、性別平等和自由的政改爭議、社群公益的，還有情感的展示行為，對於悲劇的哀悼或是對於中國食品安全所表達的憎惡等……這些聲音不只是動搖了官方對國族主義一面倒的歌頌，而且頌揚了多元的香港身分認同的意義和創造了廣場新的意義。

更重要的是，廣場上自發的社會運動背後，顯示的是監察政府和國家的

香港公民的角色。這種公民意識也就是由民間組織以維護社會的價值和利益，來監督政府和向政府施壓⁶。一如張炳良(2011: 17)所說，「大部分市民都希望以作為香港永久居民而自豪，並非如1997前般只來自經濟上的富饒或物質上的優越。他們的自豪感，最終要有賴體制上的優勢：靠多元政治、法治、對人權及公民權的尊重、問責的管治及民主的體制等。」這也就說明了在表象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上，不同的使用者如何通過共同志趣和運用物質性的象徵符號，拒絕或支持現代國家霸權和資本主義注入的單一空間意義。事實上，香港不同的團體在廣場上進行社會運動時，表達和捍衛民主自由的公民精神彰顯了本土身分認同，這種由民間組織構成的公民社會，點出了與官方所經營的以和諧為主調的國族主義的矛盾。有趣的是，廣場上一邊倡導的是官方認同的經濟資本主義和國族主義，有小部分市民的支持，更多的是迴避與無奈。另一邊表達的是資本主義的實踐與反思、民主自由的理想，民衆在廣場上更多頌揚的是本土身分認同。金紫荊廣場作為一個地方的意義，是一個複雜的創造和再創造的過程，在過程之中形形色色的有組織、或自發的行為者，會透過不同的行為與聲音給地方添加新的意義，表達的不是單純的國家與民間的對立關係，而是複雜的國族與本土的時而和諧、時而矛盾的感情和一國兩制的隱喻！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Lyotard, Jean-François. (李歐塔) 著，車槿山譯。2012(1979)。《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 rapport sur le savoir*)。臺北：吳南圖書。
- 吳俊雄、張志偉編。2001。《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
- 羅永生。2015。〈告別七一嘉年華：從虛以自由主義到公民共和論的後殖主體性〉，收錄於《本土論述2013-2014中國因數：本土意識與公民社會》，頁3-20頁。臺北：漫遊者。
- 郭恩慈。2009。《本土論述：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臺北：漫遊者。

6 陳建民語，摘自羅永生(2015：5-6)。

- 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2009。《香港文化政治》。香港：香港大學。
- 陳蒨。2015。《潮籍孟蘭勝會：集體回憶、非物質文化遺產、身分認同》。香港：中華書局。
- 張炳良。2011。〈香港身分：本土性、國族性與全球性的交織〉，收錄於《香港、生活、文化》，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頁1-20。香港：牛津大學。

二、外文書目

- Allen, J. R. 2007. "Taipei park: signs of occupation,"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1): 159-199.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renner, N. and Elden S. 2009. "Henri Lefebvre on state, space,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3(4): 353-377.
- Brownell, S. 1995.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erteau, M. D., Tr. S. Rendal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uchtwang, Stephan, ed. 2004. *Making place: state projects,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 London: UCL Press.
- Foucault, M. 1995[1979]. Tr. A. Sherida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 Grossberg, 1996. "Ident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Is that all?"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 Hall, P. Du Gay. pp. 87-107. London: Sage.
- Hobsbawm, E. and Ranger, T.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2014.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and

Golden Bauhinia Square),” in *The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attractions/hk-golden-bauhinia-flag-raising.html> (2016/06/01 瀏覽)

- Hung, W. 1991. “Tiananmen Squar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onuments,” in *Representations*, 35(1): 84-117.
-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1999. “monument,” in *GovHK*. <http://www.info.gov.hk/info/monument/eng.htm> (2016/06/01 瀏覽)
- Johnson, M. 1994. “Making time: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the space of nationality,” in *Positions*, 2(2): 177-249.
- Kong, L. and Yeoh, B. S. A. 2003.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s in Singapore: Constructions of “nation”*.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Kuah-Pearce, K. E. and Fong, Y. C. 2010.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in post-coloni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0(4): 433-448.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 Leong, W. T. 1989. “Culture and the state: manufacturing traditions for tourism,” i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4): 355-375.
- Lu, L.D. T. 2009.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5(2-3): 252-272.
- Ma, E.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Mathews, G., Ma, E. K. W., and Lui, T. L. 2008.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Meethan, K. 2001. *Tourism in global society: Place, culture, consumption*.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 Morris, P. and Chan, K. K. 1997. “The Hong Kong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oliticisation, contextualisation and symbolic ac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33(2): 247-264.
- Sinn, E. 1995. *Culture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Young, James E. 1999. “Memory and counter-memory,” in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Special Edition: Constructions of Memory: On Monuments Old and New*:6-13.
- Xu, G. 2008.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Zhao, S. 2004.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三、網路資料

大公報編。2006/04/30。〈五四升旗禮 金紫荊舉行〉，《大公報》，港聞A03。
http://dsqn.org/resources_c/newspaper_c/n_2006-04-03.htm。(2016/12/23瀏覽)

呂諾。2008/08/30。〈國旗下，香港分享著祖國的榮耀〉，《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olympics/2008-08/31/content_9742159.htm。(2016/12/24瀏覽)

李嘉言。2008/11/13。〈「洋」紫荊、紫荊與「金」紫荊廣場〉，收錄於《文化地圖》。http://www.cultamap.com/?page_id=2025。(2016/12/23瀏覽)

明報編。2010/08/24。〈菲警無能康泰團8死〉，《明報》。<http://link.mingpao.com/14188.htm>。(2016/01/15瀏覽，限時內容)

周偉立。2014/10/02。〈金紫荊廣場升旗〉，《香港商報》，A3。<http://www.hkcd.com.hk/pdf/201410/1002/HA03A02CLAA.pdf>。(2016/12/23瀏覽)

香港同志遊行2008。2008。〈彩虹擁抱金紫荊 香港同志驕傲愛上街〉，收錄於《香港同志遊行2008》。<http://hkpride.net/tc/press.php>。(2016/12/23瀏覽)

商業電台。2008/08/30。〈金牌運動員出席升旗禮五百市民觀看〉，《商業電台》。http://www.uat.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58568&csid=261_341。(2016/12/24瀏覽)

渣打香港馬拉松。2001。〈賽事歷史〉，收錄於《渣打香港馬拉松》。http://chi.hkmarathon.com/About_Us/a.htm。(2016/12/23瀏覽)

頭條日報編。2014/10/02。〈學民思潮背向升旗禮〉，《頭條日報》。http://news.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_hk/2014/10/02/303464.asp。(2016/12/23瀏覽)

歐陽杏櫻。2007/05/05。〈五四青年節 1800校齊啓動 百萬港生同步參加升旗禮〉，《文匯報》，香港新聞A12。http://dsqn.org/resources_c/newspaper_c/n_2007-05-03.htm。(2016/12/23瀏覽)

蘋果日報編。2005/11/11。〈保護維港週料萬人參與〉，《蘋果日報》。<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51111/5388122>。(2016/12/23瀏覽)